

美国动态

(半月刊)

2022年3月16日 (第256期)
仅供参考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约瑟夫·奈：美中应构建“合作性竞争”关系

好的对华战略必须适用于广泛情景，并且设定切实可行的目标。与其追求涉及政权更迭等遥不可及的目标，不如着眼于如何在基于规则的体系中实现共存。实现这一目标的合理策略是避免妖魔化中国，打造“合作性竞争”或“竞争式共存”关系。

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的破局之道

近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网站（CEIP）登载了该中心学者韩磊（Paul Haenle）等人的文章，分析了中美关系趋于紧张的原因，并提出了破局之道。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中美两国在安全、经济、技术和意识形态等问题上的对立已基本形成，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三：第一，美国改造中国的希望破灭。美国希望中国能够通过与世界日益密切的接触实现自由化，但这并没有发生，美国已失去耐心。第二，两国民间的不信任感加深。皮尤研究中心最新民调显示，高达 89% 的美国受访者认为中国是竞争对手或敌人，而大约 67% 的中国受访者对美国持负面或非常负面的看法。这种负面的相互认知可能会妨碍双方重新调整对彼此的策略。第三，中美对两国关系截然不同的看法激化了矛盾。中方认为美国对中国崛起的“遏制”直接导致了两国关系下滑，而美方则将关系恶化归咎于中国日益强硬的态度。

破局的关键在于两国要坚持务实的相处之道。拜登政府应尽快制定明确的对华政策，阐明美国的目标，这不仅有助于美国夯实与盟友之间的关系，也能为中美未来的谈判提供一个支点。对中方来说，若中国愿意为自己的行动承担更多责任，并适当修改其政策和措辞，将有助于稳定双边动态。

约瑟夫·奈：美中应构建“合作性竞争”关系

好的对华战略必须适用于广泛情景，并且设定切实可行的目

标。与其追求涉及政权更迭等遥不可及的目标，不如着眼于如何在基于规则的体系中实现共存。实现这一目标的合理策略是避免妖魔化中国，打造“合作性竞争”或“竞争式共存”关系。

《安全时报》(The Security Times)网站2月24日登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文章称，美中目前是“合作性竞争”关系，在相互依存的生态关系中要实现对华“脱钩”极不现实。文章摘要如下：

美苏之间是一场常规的“二维棋局”，两国缺乏经济和社会依存关系，双方博弈主要在军事和意识形态领域展开。与之相对，美中博弈则是一场“三维棋局”，每个维度的权力分配不同：在军事维度，美国是唯一拥有全球影响力的军事强国；在经济维度，权力分配是多极的；在全球治理维度上，权力分配是无序的。一个好的对华战略必须涵盖相互依存的所有维度。

美国必须认识到冷战时的遏制战略已不再适用于当前的中美博弈。应对中国挑战需要一个更复杂的战略，盟友是实施这一战略的资本，但美国的盟友并不都以美国的方式看待中国。“新冷战”的言论可能对维持关键联盟产生消极影响。

好的对华战略必须适用于广泛情景，并且设定切实可行的目标。与其追求涉及政权更迭等遥不可及的目标，不如着眼于如何在基于规则的体系中实现共存。实现这一目标的合理策略是避免妖魔化中国，打造“合作性竞争”或“竞争式共存”关系。

好的战略还需要谨慎的评估。低估对手会导致自满，而高估则会产生恐惧，这两种情况都可能导致误判。中国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若将北美、日本和欧洲整合起来，它们依然主导着世界经济，并有能力捍卫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从外部塑造中国的行为。这类联盟是应对中国崛起的核心。

美国对华战略的成功主要始于国内，必须建立在以下基础之上：1) 维护民主制度，这是它吸引而不是胁迫盟友的能力基础；2) 拥有一项致力于研发、保持美国技术优势的计划；3) 保持对世界的开放，重视软实力。4) 重组传统军事力量，以适应技术变革；5) 加强包括北约、日本、澳大利亚和韩国等在内的联盟结构；6) 加强与印度的关系；7) 加强对现有国际组织的参与和补充；8) 在全球治理领域加强对华合作。

美国无法以遏制苏联的方式遏制中国，但它有能力塑造中国崛起所需的外部环境。如果美中关系是一场纸牌游戏，那么美国已经拿到了一手好牌，但即使是一手好牌，如果打得不好也会输。

学者辩论美国对华战略

近日，《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 网站登载约翰·伊肯伯里 (John Ikenberry) 等学者与约翰·米尔斯海默 (John Mearsheimer) 在美国对华战略上的辩论。主要内容如下：

美国现实主义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 (John Mearsheimer) 认为中国的人口规模、地理位置以及经济结构都可能助其成为一个更强大的国家，进而挑战美国在亚洲乃至全球的地位。因此，美国的逻辑选择很明确：减缓中国的崛起。然而，美国却反其道而行之。中国加入 WTO 后并没有变成美国自由派期望看到的那般开放和自由，也没有成为全球秩序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事实证明，美国自由派的“赌注”失败了。美国采取的对华接触战略是最严重的外交政策灾难之一，一个大国积极促进同等体量的竞争对手崛起，而若采取遏制战略本可以阻止或推迟对手的出现。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伊肯伯里 (John Ikenberry) 表示，米尔斯海默错误地理解了自由派的“赌注”。自由派的目标是建

立和维护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而对华政策只是这个战略中的一部分。苏联解体后，各国争相加入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民主国家的比例翻了一番。美国主持着一个不断扩大的全球体系，创造了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多的财富。因此，从宏观意义上看，自由派战略的收益远大于成本。

此外，他认为美国除了对华接触，还通过深化东亚联盟体系和加强更广泛的亚太地区安全和经济架构从外部制衡中国力量。总体来说，美国对华战略是“围交战略”(Congagement)，即“接触”与“遏制”的结合体。美国对华战略的主要失败是没有使中国融入自由资本主义体系。而对此，米尔斯海默提出的方案是系统性地限制中国经济增长。但从道义上看，美国不应该也不能寻求让中国保持弱势、贫穷和边缘化。

他还认为米尔斯海默提出的长期且连贯的全面遏制战略是一种国家的自残行为。遏制将导致美国及其伙伴更加分裂，自由国际秩序更加混乱。经济上，美国将落后于与中国保持健康经贸关系的其他国家，影响力上，美国作为全球领导者的声誉也将被削弱。最终，这一战略不仅无法阻止中国崛起，更糟的是，中国可能因此变得更强大以及愤愤不平，更加希望脱离自由主义规范，美中合作将比今天更少。

他总结道，中美两国对世界秩序有着敌对的愿景，中国的确对美国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对此，美国最好加强与盟友的合作，加强自由民主的全球体系，同时寻找与中国合作的机会。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 (Andrew Nathan) 驳斥米尔斯海默的观点称，在人口、地理和国际体系结构各个领域，中国都存在重大弱点。中国无法像米尔斯海默所说的那样成为“亚太地区乃至世界上强大的国家”。

黎安友认为，中国的人口结构充满了问题。首先，少数民族

占据着中国边缘战略地区，与中央严重“疏远”，存在着认同问题、安全问题和领土完整问题。其次，在汉族腹地，人口老龄化严重。再次，随着经济结构的成熟，自然增长率可能会进一步下降，人均收入也会随之降低。

他认为中国的地理位置也不利。不论是陆地还是海上，其邻国都在寻求对冲和制衡中国。中国缺乏盟友，无法依托联盟关系向邻国施加压力，也无法在世界各地部署大规模军事力量。

国际力量的结构性分配同样对中国不利。中国将继续在多极体系中面对五个强大的对手——印度、日本、俄罗斯、美国和欧盟。只要这些大国仍保持活跃，中国就不太可能占据主导地位。

高估中国的威胁和低估它一样危险。大肆宣传这种危险会在美国公众和中国政策制定者中造成恐慌，从而使其更难管理。

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保罗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董云裳 (Susan Thornton) 不认为美国与华接触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误。董云裳称，冷战期间，接触政策成功说服中国与美国一道对抗苏联。冷战后，该政策助数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这是一项重大的人类成就。她表示，米尔斯海默错误地认为，结构性因素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中美冲突，而现实中存在许多能维持和平的制约因素。

首先是双边外交层面的约束。接触的目的是防止误解、提供保证和防止冲突。诚然，中美过去五年的交流乏善可陈，但这种外交缺陷并非是结构性的。如果两国高层领导人保持沟通，外交阻力就可以得到加强；其次是国际体系层面的限制。几乎全球所有的政府和机构都会因美中战争而严重受损，因此它们都会试图通过外交方式来阻止冲突的发生；再次还有全球化带来的约束。中美的接触制造了一种相互保证经济摧毁的局面；此外还有公众舆论的制约。美国政客不能忽视选民的情绪。美国公众对旷日持久且代价高昂的海外冲突保持着高度警惕；若上述限制都没能阻

止冲突，军事威慑将成为最后的希望。美中都是拥有核武器的大国，“相互确保摧毁”的原则仍然有效。

哥伦比亚大学中国项目联席主任孙哲称，在米尔斯海默看来，中国寻求颠覆美国的霸主地位，因此两国之间的冲突几乎不可避免。这一论断基于对中方意图的错误解读上。虽然中国国内关于中美关系和对美战略的争论仍在继续，但中国顶层决策者十分清楚，如果中美关系恶化，两国都将遭受巨大损失。

孙哲称，米尔斯海默错误地认为，中国作为一个日益强大的国家，其唯一目标就是挑战美国。相反，中国认为自己才是受欺凌的一方，它绝没有放弃在当前国际体系中与美国共存甚至合作的希望。鉴于中国对主权和谈判的重视，中国是保守的、维持现状的国家，相反，美国才是修正主义者。

孙哲总结道，华盛顿应意识到，中美关系可以是体面、相互理解和务实的，两国领导人无需被结构性力量束缚。

米尔斯海默对以上四位学者的回应：

米尔斯海默回应伊肯伯里称，伊肯伯里所说的“中美两国对世界秩序有着敌对愿景”实际上就证实了美国对华接触战略的失败。米尔斯海默认为，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并没有取得巨大成功，如今的美国外部面临着中俄两国的挑战，内部面临着民主的衰退。米尔斯海默否认提出过“让中国保持虚弱、贫穷和边缘化”这一观点，称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中国注定要实现经济增长，但美国真正要做的是减缓其增长的速度。此外，他认为伊肯伯里错误地将“围交”战略等同于“深度遏制”的同义词。“围交”战略中的接触和遏制本身是相互矛盾的。

米尔斯海默回应黎安友称，中国确实面临着一些挑战，但黎安友夸大了这些挑战。目前几乎没有证据表明种族骚乱正在削弱中国的实力；印度、日本等制衡联盟尚不足以阻止中国实现地区

霸权；中国也并非没有盟友；中国人口老龄化未来产生的影响还难以预测；中国经济发展的确可能大幅放缓，但中国经济仍十分强大，足以支撑其军事发展。

米尔斯海默回应董云裳称，她提出的那些外部制约因素并非坚不可摧。国际上无数大规模战争爆发之前，国家之间也存在密切联系，它们也是彼此重要的贸易伙伴，但战争还是发生了。在现代战争中，胜利仍然是可能的，并不是每一场冲突都会像她所说的那样给“所有人带来灾难性损失”。

米尔斯海默回应孙哲称，自己并非认为美中战争“几乎不可避免”，而是认为双方之间的安全竞争不可避免。中国明确表示要从根本上改变东海、南海、台湾地区及中印边界的政治现状。与此同时，虽然拜登政府愿意通过中美对话来管理双边关系，但尚没有证据表明拜登政府将回归接触战略。

美国外交

兰德：“中俄二选一”——美国战略的错误性

近日，美国兰德公司网站登载了资深政治学家拉斐尔·科恩(Raphael Cohen)的文章称，美国应同时兼顾中国问题和俄罗斯问题，而不是视中国为唯一对手。文章摘要如下：

对华鹰派认为，美国的对手只有一个，即中国。因此，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他们一直呼吁美国“克制”，因为对俄罗斯的任何回应都可能削弱美国威慑中国的能力。这一观点基于三个核心假设：第一，中国是唯一在军事和经济上皆有挑战美国主导国际秩序的对手。第二，美国不具备同时对付中俄两国的军事能力。第三，美国应该把战略重点放在中国，让其欧洲盟友去

应对俄罗斯。

然而，上述假设都存在问题，原因有三：第一，美国不能单纯地认为将俄罗斯问题交给他国处理就会好转。部分原因是俄罗斯的国家战略将美国视为主要对手，会不断借助网络等手段攻击美国。所以，即使战略上不便利，美国也必须与之对抗。

第二，美国未必缺乏同时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能力。美国在冷战高峰期的军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今天的两倍多。若未来美国国防预算能有所增长，国防能力将大幅提升。

第三，欧洲和印太两个战区的资源并不相冲。在以陆地为中心的欧洲，通常使用重型装甲部队进行威慑，这与以海上力量为中心的印太战区关系不大。在短期内，美国空中力量可以在战区之间迅速调整，有能力应对两方向上的威胁。

最后，中国和俄罗斯问题不是独立的。美国需要借助欧洲盟友与中国对抗。如果美国把俄罗斯问题留给欧洲国家，欧洲国家也可能把中国问题留给美国。

对俄金融制裁恐影响美国经济实力

美国《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网站3月2日登载了欧洲之声(Vocal Europe)外部研究员兼海湾国家分析公司分析师阿里·艾哈迈迪(Ali Ahmadi)的文章称，美西方对俄罗斯经济及其主要金融机构实施的广泛制裁，可能会对金融治国策略产生变革性的影响。文章摘要如下：

SWIFT 是一种报文传送服务，甚至不提供清算服务。将 SWIFT 限制视为制裁“金融核武器”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存在局限性，是对与 SWIFT 系统脱节如何影响国家发展的误解。2010 年至 2013 年间，通过包括 SWIFT 制裁在内的三轮欧洲自主限制措施后，

伊朗被彻底踢出了国际金融体系。要想将俄罗斯变为下一个伊朗，需要针对俄罗斯中央银行和俄罗斯海外银行的代理账户进行更广泛的限制。这将对俄罗斯人民的生活产生负面影响，甚至可能在俄罗斯内部产生系统性的和不可预测的后果。并且，俄罗斯的经济规模远大于伊朗，与欧洲的经济融合度也比伊朗高得多，对俄罗斯金融体系的全面制裁恐怕会带来反噬。

过度使用制裁可能导致制裁贬值。一方面，当美国实现域外制裁的政治目标与其盟友的偏好相矛盾时，以欧洲为主的关键盟友可能会积极制衡美国的制裁能力。

另一方面，过度制裁可能会促使其他经济体寻求 SWIFT 的替代方案。此前由于伊朗经济规模较小，情况特殊，因此当它被排除在 SWIFT 之外时，东方大型经济体及其欧洲商业伙伴并没有太大的驱动力去寻求替代方案，然而对俄罗斯的制裁有可能改变这一局面。此外，美元的地位并非牢不可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美元在全球货币储备中的份额已降至 59%，是 25 年来的最低水平。从中期来看，这可能会削弱制裁武器的效力，从长远来看，这可能会对美国经济造成破坏性影响。

美越升级“战略伙伴关系”困难重重

美国《外交家》网站 3 月 2 日登载了奥塔哥大学(University Of Otago)政治学博士蓬乌(Phuong Vu)的文章称，美越的“全面伙伴关系”是越南最初级的外交称谓，而两国要升级称谓等级面临着诸多困难。文章摘要如下：

越南在美国新版印太战略中占据重要位置，因此将美越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是华盛顿的优先事项，但越南似乎尚未做好准备。目前，越南只寻求在“全面伙伴关系”的基础上与美

国深化互利合作，没有将“战略伙伴关系”列为发展目标。

外交关系的称谓具有实质意义，能释放重要的外交信号。越南的外交等级可以分为三类，重要性从高到低依次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和全面伙伴关系。目前，越南与中国、俄罗斯和印度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十多个国家是“战略伙伴关系”，而与美国仅仅是“全面伙伴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越南对美国的外交冷落。

实际上，美越关系，比一些外交级别更高的国家来得更深、更广泛。首先，美越经贸关系深厚。美国是越南的第 11 大投资国，投资额近 100 亿美元，双边贸易额是越南与印度贸易额的 9 倍多。其次，美越国防关系牢固。2017 年至 2021 年，越南收到了美国大约 8000 万美元的安全援助，2018 年，越南还额外收到了 8150 万美元的援助用于支持美国实施印太战略。最后，除经济和安全合作外，美国还向越南提供了超过 2400 万剂疫苗。然而，纵使两国关系取得了上述进展，美越关系的外交称谓级别依然较低，主要有四点原因：

第一，对越南来说，保持当前的外交称谓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多年来，越南始终通过使用不同等级的外交称谓来捍卫和促进国家利益，并在大国之争中保持微妙的平衡。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越南既能推进与美国的关系，又可以避免付出高昂的政治、经济和外交代价。

第二，美越关系可提升的空间能够成为促进两国合作的外交诱因。越南曾在加入 TPP 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且在特朗普退出该协议后受到了巨大损失。两国关系的升级必须以强大的经济基础为前提。

第三，美国自身的政治局势存在不确定性。虽然拜登执政后不断修正上任政府偏离的航线，但越南意识到，美国的下一任总

统仍存在搅乱和破坏国际体系的可能性。

第四，意识形态问题。美西方一直致力于通过所谓的“和平演变”来推进越南的民主。越共党内的一些派别担心升级对美关系会鼓励其他团体挑战越南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美国适应多极化时代的制约因素

美国《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网站3月6日登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尼古拉斯·格沃斯德夫(Nikolas Gvosdev)的文章称,美国曾以和平方式结束了冷战局面,并以领导者的角色建立起了一个互联互通的繁荣世界。然而,对美国而言,当前的地缘格局、技术变革以及国内政治困局三大因素正日益成为其在多极化世界中获利的阻碍。文章摘要如下:

首先,从地缘格局来说,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一直尝试通过开发新的反介入技术或反区域封锁技术,以及建立替代性金融系统的方式来抵消美国拥有的相对优势,其中,以俄罗斯和中国尤甚。并且,为了避免在美国具有压倒性优势的领域与之竞争,这些国家试图将竞争重点转移到他们具有主场优势或更有竞争力的地区和领域。

其次,从技术变革来说,技术变革允许其他国家利用新技术的不对称能力遏制美国的权力应用,这削弱了地缘政治的“单极性”。在这个竞争的新时代,信息技术比武器弹药更重要。此外,技术变革还为个人和团体提供了与国家和地区“脱钩”的机会,促进了“非极性”的兴起。例如,区块链技术的革新推动了新形式货币(比特币等)和支付体系的发展,而这些货币和系统的发行无需与任何国家关联,也不需要实体储备空间。

再次,对美国来说真正的挑战是,能否良好应对日益僵化的

国家安全体系和功能失调的国内政治。美国需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应对民主扩张战略已经走到尽头的现实。美国不得不承认，在不久的将来，全球层面的问题将更少依赖于美国主导的制度主义，而是选择通过一系列谈判达成共识。并且，美国国内政治面临着严重的极化。第二个问题是如何让美国国家安全机构实现地区转向，以便更有效地服务于美国 21 世纪的全球战略。冷战后，美国的战略注意力锁定在东西轴线上，要想实现南北转向需要数年时间搭建基础设施，并且有可能损害当局者的既得利益。

目前，美国仍是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力量，但过去三十年的权力转移是真实存在且不可逆转的。未来的全球秩序恐怕将由“多极化”和“非极化”来定义，国际关系也将更多取决于大国之间的互动。在国际形势再次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美国战略家应当考虑如何更好地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并且利用美国的权力杠杆来维持其地位。

美国政治/其他

美学者：拜登或将迎来政治重生

美国国会山报(The Hill)网站 3 月 9 日登载班农通讯研究公司首席执行官布拉德·班农(Brad Bannon)的文章称，俄乌冲突中拜登的强硬态度可能助其在总统选举中获得更多筹码，进而赢得选举。文章摘要如下：

据最新民调显示，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拜登的支持率有所回升。回升幅度虽然不大，但对民主党来说意义深重。这意味着拜登自由落体般下滑的支持率出现了转机。危机将资源再次汇集到拜登周围，舆论的转向对民主党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对拜登来说，通货膨胀仍然是美国国内面临的严重问题。而俄乌危机又进一步打乱了国际石油市场。拜登应对乘机哄抬物价的石油公司进行谴责和制裁，让民众感受到在危机面前，总统强硬的态度。

此次俄乌危机为美国民众提供了一个对比拜登和特朗普的机会。拜登虽然承诺避免在乌克兰与俄罗斯直接对抗，但却始终在道义上支持着这个陷入困境的国家，使得美国的威望没有在此次危机中落地。拜登在此次危机中表现得冷静、沉着且强硬。特朗普是 2024 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热门人选，但在困难时期，选民更希望选择一位坚定的掌舵手，而非有妄想症的煽动者。

《政客》：州长竞选成民主党的新优先事项

美国《政客》杂志 (Politico) 3 月 6 日发表了政治记者埃琳娜·施耐德 (Elena Schneider) 等人的文章称，民主党人的竞选注意力正从国会选举向外延伸，囊括了关键州的州长竞选。民主党认为这对未来该党的总统选举，甚至对民主治理本身至关重要。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民主党通常会将精力和资金集中投入到国会两院的竞选活动中。而共和党试图推翻 2020 年选举的行为让许多民主党人认识到，竞选州长在维护美国民主问题上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近来，民主党党内领袖、捐助者以及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Super PACs) 纷纷将 11 月的州长竞选列为其优先考虑事项。

民主党人声称对州长竞选的关注不会以牺牲参议院和众议院的竞争为代价。但是，党内一些人私下认为，更多地关注州长竞选，至少是默认他们在中选里可能会失去对众议院的控制。

民主党尚未能通过投票权立法。在没有立法行动的情况下，

民主党人希望州长一职能够对共和党主导的法律起到一定的封锁作用。宾夕法尼亚州、威斯康辛州和密歇根州的民主党州长自视为自由选举的堡垒；而在共和党控制的亚利桑那州和佐治亚州，竞选州长的民主党人则将自己视为该党抵抗共和党的最后防线。

除了制衡共和党的势力，部分捐助者认为民主党州长是该党最强大的支持者，而且很可能是该党的未来。若拜登退出，民主党可以从州长中寻找潜在的总统候选人，如北卡罗来纳州州长罗伊·库珀（Roy Cooper）和佐治亚州州长候选人斯塔西·艾布拉姆斯（Stacey Abrams）。

民主党重视州长选举不纯粹是为了政治，也是为了在行政和政策问题上保持关键的伙伴关系。现任民主党州长们在新冠疫情期间对国家抗疫政策的支持以及通过大规模基础设施法案的举措就是证明。

共和党的系列失误恐阻碍其获得参议院控制权

美联社网站3月7日登载该社首席政治记者史蒂夫·皮普尔斯（Steve Peoples）等人的文章称，就中选的总体趋势来看，共和党似乎握有更大优势。但共和党在近期的竞选行动中发生的一系列失误正严重威胁其获得参议院控制权机会。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失误之一是动员失败。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州长道格·杜西（Doug Ducey）已宣布他将不寻求竞选连任。杜西的决定让曾对其寄予厚望的共和党盟友感到失望。他的退选意味着在当前拥挤的共和党初选赛道上失去了具有明显优势的竞争者。

失误之二是筹款不足。亚利桑那州、佐治亚州、内华达州以及马里兰州等州的共和党候选人正在努力跟上民主党的筹款步

伐，但总体差距仍然明显，民主党占据了极大的财务优势。例如，在内华达州，即使是胜选几率最低的民主党参议员凯瑟琳·科尔特斯·马斯托（Catherine Cortez Masto）去年年底已拥有 1050 万美元的竞选资金，而共和党前州检察长亚当·拉克萨尔特（Adam Laxalt）仅拥有 170 万美元。

失误之三是激烈内讧。共和党除了要接受来自民主党的猛烈抨击外，其党内也爆发了激烈矛盾。共和党参议院中期选举负责人、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里克·斯科特（Rick Scott）最近发布了一项针对美国低收入人群和老年人的征税计划。对此，在佛州参议员竞选中暂时领先的民主党众议员瓦尔·戴明斯（Val Demings）予以严厉批评，表示该计划会对工薪家庭和老年人群体造成伤害。而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也公开谴责了斯科特的计划。斯科特与麦康奈尔之间的辩论使得共和党内部裂痕加深。

共和党虽面临诸多挑战，但民主党的情况也并不乐观。据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拜登政府的执政满意度只有 29%。民主党在拜登获胜的亚利桑那州、佐治亚州、内华达州以及宾夕法尼亚州的優勢也并不明显，共和党存在翻盘的可能性。

民调网站 538：“白人自由主义者”普遍存在政治焦虑

美国民调网站 538（FiveThirtyEight）近日刊登了美国企业研究所（AEI）民调和舆论研究员丹尼尔·考克斯（Daniel Cox）的文章称，虽然美国民众普遍对政治感到悲观，但存在一定的群体差异。文章摘要如下：

据 AEI 最新民调显示，从总体趋势来看，只有不到一半的美国民众对国家的未来感到乐观，并且，与其他种族群体相比，美

国白人的悲观情绪更深，其中又以白人福音派群体最甚。

从党派来看，民主党人总体上比共和党人乐观，但民主党内部存在明显的种族分歧。超六成的黑人民主党人（68%）和西班牙裔民主党人（62%）表示他们对国家的未来有些或非常乐观，但白人民主党人中仅有 53% 的人表示乐观。

根据盖洛普的调查，如今有更多美国人认为自己是自由主义者，其数量达三十年来之最。按照美国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左倾选民的前景一片光明。然而，民主党人，尤其是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自由主义者却表达出强烈的政治焦虑。原因主要有四：

第一，社会活动日趋单一。白人自由主义者将政治置于首位，减少了宗教参与等其他类型的社会活动。据盖洛普调查，2020 年只有 35% 的左派隶属于某个教堂或宗教团体，低于 1998 年的 56%。然而，政治活动通常较难获得更强的社会联系和满足感。

第二，媒体偏好。与其他美国人相比，白人自由主义者会花更多时间阅读政治新闻。然而，他们中约 40% 的人密切关注国家政治新闻，而只有 20% 的人经常关注当地新闻。这可能导致该群体会接受与其所生活的社区严重脱节的国家政策。例如，黑人和西班牙裔民主党人比白人民主党人更支持增加地方警务支出。

第三，政治斗争。白人自由主义者在政治斗争消耗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力，但最终成功的可能性很低。

第四，参与政治的方式。白人在阅读、交谈和思考政治上花费的时间比黑人和拉丁裔多，但后两者在政治组织中做志愿者的可能性却是白人的两倍。并且，受过大学教育的“白左”更有可能投身政治，而不是建立联盟来解决社会问题。

综上所述，白人自由主义者对未来的悲观有一定根据。对政治感兴趣是成为积极公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对于这一群体而言，更多地参与地方事务和组织可能会带来更多的个人回报。

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编辑部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编辑部：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邮编：200020

电话：021-33665148

工作邮箱：bianjibu@sias.org.cn